

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未来情景分析

超然

蒙古国立大学，蒙古国乌兰巴托，17010；

摘要：中美经贸关系已由互补逐渐转向结构性竞争。文章梳理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四个演化阶段，并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成因。研究表明，贸易失衡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动因在于美国国内政治诉求及对中国高新技术崛起的战略遏制。基于“常态化对峙”“谈判妥协”“冷战2.0”三种情景，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未来走向，并提出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关键技术突破和制度型开放，构建更具韧性的对外经贸格局。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政策；情景分析；对策

DOI：10.69979/3029-2700.26.03.020

引言

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自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规模持续增长。中美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6901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美国消费者从低成本进口商品中获益，中国企业也获得了技术、资本和市场。然而，在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贸易逆差扩大和产业竞争加剧等问题逐渐显现，为后来的贸易摩擦埋下伏笔。

2017年8月，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标志着中美之间影响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开始。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并对钢铁和铝进口加征关税，贸易战正式升级。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545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随后限制中国获取部分核心技术产品及加强投资审查。此后，中美双方经历多轮互加关税，双边经贸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2020年1月15日，两国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华经贸政策总体仍延续竞争框架。随着特朗普于2025年再次执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更强竞争取向，使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这也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并探讨其未来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思路。

1 中美贸易摩擦的演变

第一阶段为平稳扩张期（2001—2017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贸易快速发展，中国凭借低成本制造业优势扩大对美出口，美国则在农产品和高端产品领域扩大对华出口。该阶段中美贸易互补性明显，双边贸易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对美长期保持贸易顺差。

第二阶段为摩擦加剧期（2018—2019年）。2018年美国依据“301调查”大幅提高对华进口关税，中美贸易摩擦正式爆发。关税提高增加了中国产品在美销售成本，对中国出口形成冲击。此后双方多轮互加关税，双边贸易增速放缓，部分产品出口明显下降，贸易结构受到影响。

第三阶段为缓和与调整期（2020—2024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此前对华竞争取向，未大规模取消加征关税。但在企业调整供应链和疫情期间部分产品需求上升的影响下，中美贸易出现阶段性恢复，也表明贸易摩擦逐渐由关税冲突向制度化、长期化竞争演变。

第四阶段为摩擦再度升级期（2025年至今）。特朗普于2025年再次执政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进一步强化对华竞争，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对电动汽车、光伏设备、锂电池和半导体等战略产业加强限制，使双边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新的调整阶段。

2 中美贸易的摩擦成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导火索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

持续扩大。根据 TradeMap 统计, 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达 4317 亿美元, 进口约 1548 亿美元, 顺差规模达到 2768 亿美元, 占当年中美贸易总额的一半, 创下了当年的历史新高, 这成为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当美国看起来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时, 就会为了自身利益, 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随后特朗普政府通过“301 调查”认定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 并据此在 2018 年分三轮对总计 2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

2.2 国内政治选举考量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 中美贸易紧张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选举、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长期以来, 美国部分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导致传统产业衰退和就业压力上升。在此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争取蓝领和制造业工人的支持。一些研究指出, 美国政府往往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 并通过强化“中国威胁”的叙事来赢得选民支持, 从而推动更为激进的贸易政策。

2.3 美国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的遏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 在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等领域快速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逐渐由互补转向竞争。同时, 美国面临传统产业衰退、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 国内保护主义情绪上升, 双边贸易结构性失衡加剧。伴随中国综合实力增强, 美国通过提高关税并加强对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限制, 以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维护其经济利益, 使贸易摩擦由局部争端演变为更广泛的贸易冲突。在《中国制造 2025》等政策推动下,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也引发美国对其技术和产业优势被削弱的担忧 (胡晓玲, 2021)。美国进一步加强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 使双边贸易摩擦呈现长期化、结构化趋势。

3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与可能走向

3.1 贸易摩擦常态化、长期化

中美短期内难以就核心贸易问题达成全面协议, 但双方都认识到贸易战成本高昂, 因此会避免冲突失控。美国维持对华现有关税, 并加强对高科技和关键行业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 中国则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缓冲外部冲击。总体来看, 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但难以急

剧升级, 双边贸易虽有波动, 但市场需求和产业互补性仍支撑较大贸易规模。在此背景下, 企业开始调整供应链布局, 中美经济关系逐渐由高度依赖转向风险分散。

3.2 双方达成共识、避免贸易战

美国国内通胀高企、企业成本上涨, 美国农产品及能源出口又有直接的对华利益诉求, 故美国在若干领域有对华缓和的内在动力, 而中国在扩大进口、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诸方面都主动、系统地推进制度性开放, 由此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也因此能在谈判中作出具体、可操作的技术性让步, 例如购买更多美国产品, 放松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限制。大卫科茨 (2020 年) 对此做了极好的总结: 若美国对中国崛起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贸易紧张局势自然会缓和。

3.3 贸易战演化为冷战 2.0

美国通过提高关税, 并联合盟友在技术标准、金融体系和产业政策等方面限制中国, 而中国则通过扩大内需和加强自主创新, 减少对外国市场和关键技术的依赖。Kapustina L 等人 (2020) 指出, 这种新对抗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一是在经济深度相互依存背景下出现技术脱钩, 如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 二是平行技术标准体系的形成, 5G 领域已出现对立的技术联盟; 三是经济竞争与战略遏制相结合, 美国通过技术限制遏制中国发展, 而中国通过 4 “一带一路” 倡议扩大区域影响。

4 对策与建议

4.1 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

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对美出口规模较大, 因此在贸易摩擦发生后更容易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在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背景下, 中国应加快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具体而言, 应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合作, 积极开拓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市场, 并推进区域贸易协定谈判, 以稳定外部需求。出口市场多元化不仅有助于分散贸易风险, 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外贸体系的稳定性。

4.2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已经从关税领域发展到高科技、战略产业领域,美国正在用技术封锁、出口限制的办法对中国施压,因此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关键技术,主动保护供应链。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产业政策,制定有利于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规则,由此减少对外国零部件的依赖,也自然摆脱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为未来积累新优势。

4.3 以制度型开放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稳定外资与企业预期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扩大制度型开放成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政策选择。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向国际社会传递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信号,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应在市场准入、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 and 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以规则吸引外资,维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并防范单方面贸易限制带来的风险。

4.4 积极参与多边与区域经贸治理,提升规则制定话语权

中美贸易摩擦实质上是全球经贸治理体系调整中种种深层次矛盾的外在表现,因此中国宜主动、有力地参与多边及区域经贸治理,以制度协调、规则参与的方式提高自身话语权,又以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为契机,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供应链安全诸领域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切实扩大制度性影响。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规则层面的主动作为正是中国争取有利国际经贸空间的最佳方式。

5 结论

在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时可以看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这应成为当前和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

重要目标。如果持续扩大摩擦甚至升级为贸易战,双方都难以成为真正的赢家。因此,中美仍应推动互利合作,保持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同时,还应完善贸易摩擦的预警与应对机制,以提升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陀才进,孙慧,杨巨星.特朗普2.0“对等关税”政策与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效应[J].消费经济,2025,41(05):19-43.
- [2]邹鸽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J].中国商论,2025,34(22):65-68.
- [3]Kapustina L, Lipková L, Silin Y, et al. US-China trade war: Causes and outcomes[C]//SHS Web of Conferences. EDP Sciences, 2020, 73: 01012.
- [4]Chong T T L, Li X. Understanding the China-US trade war: causes, economic impact, and the worst-case scenario[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2019, 7(2): 185-202.
- [5]胡晓玲.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影响及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09):1-3.
- [6]李佳晓.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及对策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20):52-53.
- [7]张爱玲,欧阳秋芳.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20,(06):62-73.
- [8]田宇翔.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09):50-52.
- [9]大卫·科兹,宋朝龙.中美贸易冲突产生的根源及可能的前景[J].国外理论动态,2020,(01):150-153.

作者简介:超然(2001.05-),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贸与海关管理。